我心目中的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

李　天成　第 11 期笹川生

国立感染症研究所 主任研究官

我出生在山东省内陆乡村，受 3 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两岁时随父母闯关东来到了黑龙江省的一个边远的小村，在那里一直生活到高中毕业。由于当时学校条件差没有外语老师，为了考大学只好临时抱佛脚跟收音机里播放的外语广播讲座学了点日语，没想到在那个无可奈何的环境下硬着头皮学下来的那点日语，竟让我和后来的日中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结下了不解之缘，而日中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恰恰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今后要走的路。

凭借着跟广播讲座学来的那点日语在高考中获得的十几分，我的高考总成绩才勉勉强强地过了本科分数线，被黑龙江中医学院中医系录取，也是因为这十几分的日语成绩我的公共外语课被安排在日语班。恰好又是因为对自己日语能力的盲目自信，在硕士毕业时毅然放弃了考博的机会，义无返顾地选择了毕业考笹川奖学金之路。硕士毕业后的第二年，顺利地通过了省内和全国的两次笹川奖学金选拔考试，于 1992 年 9 月作为第 11 期笹川生如愿以偿地来到了日本大阪大学。尽管没能去上第一志愿的东京大学，能到大阪大学也没有感觉特别失望，毕竟这也是所名牌大学，长春培训时在日语老师的极力推荐下曾看过田宫二郎主演的《白色巨塔》，知道作为浪速大学的原型就是大阪大学。

说到长春的日语培训还真是受益匪浅，尤其是四位性格迥异，教学方式完全不同的日方教师的身体力行更是让我的日语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在这点上要比 31 期时以后的笹川生幸运得多，据说他们只有一位外教而且授课时间也很短。就是在这段培训期间看了诸如《白色巨塔》，《东京爱情故事》等著名的或是当时流行的日本电影和电视剧，从荧屏上多多少少对日本有了一点感性认识。不过说实话如以感兴趣的程度来说《东京爱情故事》还是远远在《白色巨塔》之上，毕竟前者的内容要比后者轻松得多浪漫得多。遗憾的在此之后一年的研修过程中不但没有体验到《东京爱情故事》里的轻松和浪漫，反而感受的却是更多的无可奈何——至少当时的感觉是这样。

在 90 年代初出国还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和每位笹川生一样，面对这样一个难得的出国机会，在来日之前我也对这一年的留学抱有极大的期望，期望这一年会学到很多新知识，新技术，希望有机会发表篇像样的论文，希望有机会在日本拿个博士学位，也希望在这个国度里结识些好朋友等等。我所在大阪大学第一内科的消化研究室的主要研究课题是丙型肝炎病毒，当时丙型肝炎病毒的全长核酸序列刚刚搞清不久，加上它和输血后肝炎及肝癌有着密切的联系，丙型肝炎病毒在日本是个很热门的研究领域，但在国内还鲜为人知。对于毕业以后一直从事肝炎病毒研究的我来说，这样的研究课题是充满了魅力的。就是这样带着满怀的憧憬和期望在日本开始了丙肝病毒的研究——确切地说该是研修。

一旦进了研究室才发现事情和原本的期待完全不同：到了研究室却和指导教官见不着面，

原来带我的责任早已移交给下面的讲师，讲师又把直接指导的任务下放到助手，助手又安排我和博士课程的学生一起做试验，实际上博士课程的学生才是我的直接指导老师。在这种被推来让去的过程中，就有了一种成了别人的负担感觉。那是自信心遭到的第一次打击。原以为会点日语在沟通交流上不会有问题，不久就发现过去学过的日语只有在买菜和闲聊时才会有用，而在实验室又很少有人会和你聊天。那感觉就象一个新转校来的学生只能带着羡慕的眼光看着别人在说笑。工作中即便是讲日语，关键词也都是些没有学过的外来语，来日本前的对日语能力的自信就象是从通天阁的顶上一下子落到地面被摔得粉碎。

尽管如此，想学的还要学，想做的还要做。毕竟从技术设备上来讲，这里的条件要比国内的条件好得多。好多试验方法，试验技术都是听说过没见过，或是见过却没做过，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值得庆幸的是那位博士生也很友善，也很尽职。就这样在他的指导和我的努力下，很快就掌握了从引物的合成到核酸的提取扩增，从质粒重组纯化到碱基序列测定这些分子生物学的基本试验技术和技能，并开始利用这些技能帮那位完博士生成其毕业论文所需要的试验。就是在这个阶段多少还有些成就感。但日久天长，每天重复同样的试验，而试验技能也只局限在博士论文所涉及的试验内容之内，就不免感觉乏味和茫然。当时很想有一个自己独立承担的课题，很想在整体的试验设计上和实施课题的过程中接受些更高质量的指导。到最后不仅未能如愿，还感觉自己被当成了一个廉价的实验员。

就这样怀着错综复杂的心情度过了一年。这一年结束即没有论文发表，也没有学会发表，有形的收获什么也没有。在离开研究室的时候，只有一种空手而归的失落感。在成田机场和来送别的日中医学协会的职员及日语老师告别时，虽说是一边挥着手一边说再见，但心里却在想，估计今后不会有机会和大家在日本再见了。

世事难料，回国一年半后的 1995 年 3 月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以公派身份来到了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在这里开始了戊型肝炎病毒的研究工作。戊型肝炎病毒和丙型肝炎病毒虽是不同的病原体但应用的研究方法和试验技术基本相同，再加上工作上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度，所以很快就进入了状态，而且试验进展极为顺利，不到两年就成功地利用重组杆状病毒的方法体外合成了戊型肝炎病毒的类病毒颗粒，由于它和原始病毒有着相似的立体构造，产量高易纯化，又没有感染性，所以这个类病毒颗粒是戊型肝炎病毒的诊断试剂和疫苗开发的绝好的材料。这不仅在当时是世界首创，即使现在能体外合成戊型肝炎病毒的类病毒颗粒的也为数不多。目前正利用这个成果由日中双方以共同研究的形式来开发戊型肝炎的疫苗。基于这也研究业绩，2002 年我被国立感染症研究所以主任研究官的身份聘为正式职员，这在当时厚生省雇用外籍职员是没有先例的。2005 年获得了第 30 届多谷勇纪念疫苗研究奖，这也是这项奖励实施 30 年来第一次颁发给外国人。除此之外，在研究戊肝病毒过程中还发现了新的昆虫病毒，现在又成功地建立了多年来悬而未解的戊肝病度的细胞培养体系，开启了阐明戊肝病毒的复制及治病机理的大门。

从笹川奖学金进修结束到现在已有过去了十多年，重新回顾这些年的经历，才发现后来在感染症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实际上大多是建立在作为笹川生在大阪大学进修的那一年的基础

上的，假如没有那一年的进修，自然不会掌握那么多试验技术，没有那一年的经历，就不会学会忍耐，没有了这些，也就没有后来的一切。事过多年我似乎才渐渐地体会到了那一年的真正价值：首先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给我提供了一个看外面世界的窗口，这个窗口不仅开阔了我的视野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固有的观念，其次，它给了我一个了解掌握先进的知识和技能的机会。视野的的开阔观念的改变加上先进的知识和技能自然就提高了成功的概率。更重要的是给了我一个适应各种各样外界环境的绝好时机和场所，可以说这一年使我在精神和知识两方面都有了一个锻炼和提高的机会。在当时的环境和背景下如果没有笹川奖学金这个项目，估计我一时半会儿是不会有机会出国，没有中的笹川医学奖学金制度自然也就没有了现在的我。

我个人对笹川奖学金制度的认识是经历了从憧憬到失望，又丛失望到重新认识和认可这样一个迂回曲折的过程。在国立感染症研究所工作的这十几年间我结识了十多名来这里研修的笹川生，也承担了几期笹川生的直接指导工作，有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笹川生的机会。分析造成当时的失望感觉有几种原因，其中既有接受笹川生的研究机关和带教导师方面的经验或对笹川生重视程度的不足的一面，也有我本人缺乏积极主动性的一面。如果指导教官能更多一点设身处地为笹川生着想，设立独立课题，明确研究方向，有意识地提供和周围交流的机会，如果我不是顾虑提出自己的要求会给带教老师增添负担，更积极主动和周围进行交流，也许会和大家有更多交往的机会，这一年或许会感觉更充实。另一种原因就是急于求成的想法造成了只看眼前的得失，只想用有形的成果来评价那一年的价值，而完全没有想到这一年中耳寓目染的见识和经历虽然无形却富有更深远的价值。

现在对笹川奖学金制度第三期项目已经启动，每年还会有 30 名新的笹川生来日本，尽管时代不同了，尽管中国的经济水平，科技水平，新的笹川生个人的知识技术水平以及思维观念都与十几年前有了很大的不同，但他们在和指导教官及周围的交往上依然会遇到我们这些过来人曾遇到过的同样的烦恼，还会经历到我们所经历过的类似的波折。如果能把我们这些过来人的所经历的经验教训传达给他们，就有可能让他们不重复或少走我们所走过的弯路。2006 年在日中医学协会的大力支持下，在在日的笹川老生们积极努力下自发地成立了在日笹川生联络会，旨在争取在学习和生活两方面为新笹川生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给新笹川生提供一个可以倾诉的窗口，使他们在日的研修生活过得更充实。衷心希望今后的每一届的笹川生都能让自己融入研究室这个不大不小却在某种程多度上反映着整个社会的圈子里，让这一年的研修生活过得愉快而充实。也希望有更多的在日笹川生参与进来，使这项活动搞得更有效更广泛更有实际意义。

20 多年来笹川奖学金制度的实施不仅为中国的卫生事业培养了大批的人材，同时笹川生这条纽带也把已成为中国医疗卫生行业的尖端人才的笹川生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强有力的的网络，这是一笔更大的财富。相信不久的将来这个网络势必产生更强大的影响力，酿出更卓越的业绩。为了能让这个网络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作为笹川生的一员衷心希望笹川奖学金制度能长久地持续下去，希望它在继续为中国卫生事业培养人才的同时，还能开展

一些日中两国间的更高水平的共同研究项目使笹川奖学金制度培养出来的笹川生名付其实地成为日中交流的桥梁和栋梁，只有达成这样的成果才是对为笹川奖学金制度付出了大量心血和汗水的日本财团，日中医学协会，日本保健纪念协力财团及中国卫生部的工作人员的最好回报。